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

黄丹阳

摘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体”与“用”的相互贯通构成其体用辩证法:从文脉传承的历史逻辑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下,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即“源流根枝之辩”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文化发展的理论逻辑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从传统与当代、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中提出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性解答;从文化建设的实践逻辑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坚持“两个结合”的方法论路径,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两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5)04-0026-09

基金项目 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GZC20231985)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双向互动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呈现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明体”,即正确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和科学性原则,以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一系列重大创新观点为主要内容,集中体现这一思想的文脉赅续之源、服务人民之本、守正创新之道;“达用”,即有序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战略路径和实践要求,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涵盖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为主要内容,重点凸显这一思想的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明体”为纲,“达用”为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理论创新与文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在“体”与“用”的辩证统一关系中书写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纲要新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在文脉传承层面阐明了创新“源流根枝之辩”的历史逻辑,在文化发展层面揭示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理论逻辑,在文化建设层面提出了坚持“两个结合”之路的实践逻辑,由此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

一、创新“源流根枝之辩”

从文脉传承的历史逻辑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坚守理论创新的魂与根,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促进了中华文脉的生命更新。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1]文脉同国脉相连,由五千多年文明史滋养的中华民族代代绵延,我们的文化基因植根于中华历史文化的悠久传统,也塑造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历久弥新、与时俱进的文化生命力。

中华文脉的赅续传承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追根溯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在文化传统上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流根枝之辩”。所谓“源流根枝之辩”,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家们关注的“体”“用”关系问题,这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本根论的重要内容。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体”“用”

是关涉天地万物之本根本原的一对重要概念。“体”即本体、本根、本原，象征着天地宇宙之间的起源、人伦德性内含的发心、事物变化遵循的规律；“用”即功能、流行、发见，象征着具体的、多样的、变化着的事物及其功用。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上部“宇宙论”的第一篇“本根论”中详细阐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意蕴：“在古代哲学，与本根对立的，即是‘物’，物是本根所生者。后来方有‘用’的名称，与‘体’对立。用的本来意谓是功能，衍变而成为‘流行’或‘发见’的意思。体是本原，由此本原而流出或发生者为用。”^[2](P70)中国传统哲学的“体”与“用”虽然意义有别，但并非相互疏离，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中国哲学，本根与事物的关系，不是背后的实在与表面的假象之关系，而是源流根枝之关系。”^[2](P77)其中，“体”如根与源，“用”如枝与流，根源孕育支流并促其代代繁茂，支流发自根源并保证生生不息，故而体用虽有殊异，但终究“体用同源”。千百年来，众多中国传统哲学家们秉承“体用同源”辩证思想，为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添上了浓墨重彩的历史印记。北宋程颐有言：“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同源，显微无间。”（《二程集·文集》卷八《易传序》）南宋朱熹也沿用这一表述阐释道：“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盖自理而言，则即体而用在其中，所谓一原也。自象而言，则即显而微不能外，所谓无间也。”（《朱子文集大全类编》第六册卷一《答汪尚书》）明代王阳明更是强调：“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同源’。”（《传习录·薛侃录》）一方面，体即用之藏，显即蕴于微；另一方面，用即体之显，微即函于显。天地间的大道本原规律藏于极细微处，万事万物的功用变易流动彰于极显明处；更进一步，正如万事万物由天地本原生发又以其各异形态彰显着本原，最精微的事物中也蕴含着大道，最宏观的规律也显现于微末，由此可知，事理一致，显微无间，体用同源。

基于历史文化传统的沃土，中华文脉在其生命更新的进程中又与马克思主义魂脉一脉相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辩证思想为科学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层面对文化的起源、作用和本质等作了深刻阐释。其一，在本体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在关于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的阐释中，揭示了文化的起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明，人们进行精神活动、从事精神生产的重要内容——既包括“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也关联“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3](P151)——都是人们物质活动的产物。其二，在认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通过认识的辩证运动说明科学理论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意义，强调了文化的作用。虽然人的精神活动受到物质活动的制约，但是，一旦人的精神活动的成果转化为强有力的物质力量，亦能现实地影响物质活动。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强调的，抓住事物根本、掌握人民群众的科学理论，同样能在无产阶级手中由“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3](P9)；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也提及“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4](P97)。在实践与认识双向互动的意义上，文化与文明相通，无论是狭义文化包含的科学理论，还是广义文化辐射的人类文明，都基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所产生、反映的人们社会实践状况，是引导人们的社会实践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三，在历史观层面，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阐明了文化的本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更，包含意识形态形式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5](P3)。与此相一致，恩格斯在1894年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明确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6](P649)可见，文化作为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及其结果，既以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或促进或延缓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文化为变革上层建筑进而影响经济基础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精神动力。

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辩证思想具有相结合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一方面，结合的可能性在于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辩证思想彼此契合。中国传统哲学关于“明体”指向的掌握世界本根及其规律性的理解、关于“达用”指向的通达事物功用及

其变易性的理解,都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变化发展的观点相合;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即用即体”“体用同源”“明体达用”的表达,都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相融。马克思主义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中国传统哲学也从体与用、明体与达用的双向互动中尝试认识世界、践履人生,二者彼此契合的辩证思维回应了结合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结合的必然性在于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辩证思想能够互相成就。基于唯物史观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1](P669)^[6](P649),并强调人们是在既有历史条件下、在既定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秉持这一立场,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主张文化创造的主体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文化,而是以赓续传承的文化传统为丰富积淀,以当下既有的具体实际为生动材料,进行历史的、现实的文化创造。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文化理论和辩证思想焕新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的当代价值,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又以鲜明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二者的结合相互成就,以新文化的面貌反映新时代的发展。

坚守理论创新的魂与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辩证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际、同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实现了对“源流根枝之辩”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是关于体用范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从宇宙论、本根论意义上探讨“体”与“用”,将其内涵阐释为形而上的本体与形而下的功用。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体”表示万化之始、万德之端、万理之原,“用”表示具体之物、万殊之象、变易之动,“体”与“用”是中国传统哲学家们解读宇宙万象的存在运转“是什么”、天道天理的教化彰显“怎么样”等哲学问题的范畴,对这一对范畴的理解依靠了哲学家们的主观了悟和思辨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虽然沿用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关于“体”“用”的话语表达,但超越了传统体用范畴的宇宙论、本根论视阈,将新时代的体用范畴拓展至文化建设的实践论视阈和文化创新的方法论视阈当中。从文化建设的实践论视阈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以蕴含一系列重大创新观点的文化理论为“体”,以涵盖一系列战略部署的文化工作为“用”,强调文化理论创新与文化建设实践的结合,既阐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什么”、这一文化“为什么”具有中国特色,又指出新时代文化建设具体“做什么”、应“怎么做”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从文化创新的方法论视阈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强调“明体”,注重把握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和科学性原则,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的方法论遵循;而且这一思想主张“达用”,倡导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将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和科学性原则运用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领域、各方面和总过程。由此,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将抽象的传统体用范畴转化为生动具体的新时代体用范畴,赋予这一对范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现实的实践意义。

二是关于体用关系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强调体用同源,认为体用关系恰似源与流、根与枝,相互成就,非相疏离。“要之,中国哲学最注重本根与事物之统一不离的关系。事物由本根生出,而本根即在事物之中。”^[2](P78)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家中坚持体用同源思想的代表,王阳明从心即理的唯心主义立场出发,阐明了体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一,体立而用达,明体必须作为达用的前提。他指出:“体用同源,体未立,用安从生?”(《传习录·薛侃录》)立体达用,正如一以贯之的功夫,“一”是体,如树木的根本;“贯”是用,如树木的枝叶;只有本体得到确立才能全面发挥事物的功用。其二,体用发乎心,心与物表现为体与用的关系。王阳明指出:“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传习录·陆澄录》)在他看来,心之本体即天理,人们只要不断向内探求,明白自己的心体,就通达了天理天道,也就自然而然地掌握了心之发用。可见,王阳明的体用关系思想固然有其辩证的方面,但究其本质依然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用观。对此,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对传统体用关系思想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改造。一方面,这一体用辩证法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协调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承认物质文明对人类社会文明体系的基础性作用,而且认识到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具有反作用。由此,秉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观点,习近平文化思想既从“明体”层面高屋建瓴地揭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也从“达用”层面将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举措贯彻到人民生活全过程。另一方面,这一体用辩证法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理念,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呈现出的“明体”首要就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达用”首要就是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健全这一工作体系既是对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具体部署,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实践要求。由此,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将唯心主义的传统体用关系思想转化为唯物辩证的新时代文化建设体用观,更新了体用关系思想的根本立场和理论基础。

三是关于体用价值阐释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所谓“明体达用”,遵循“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体用合一”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主张天道真理与人伦情理相一致、为人智识与生活实践相一致、事理原则与万物功用相一致。例如,北宋教育家胡瑗重视教化对道德人格的示范作用,认为圣贤既以仁义道德为己任,也通过上行下效的方式将这一内容教化百姓。大凡圣贤君子,“推己之仁以及天下之人,施己之义以合天下之宜,广大宏博,无所不通”(《周易口义》)。胡瑗将“明体达用”融入其教化思想,指出应将圣贤之道、大易之道传授于民并融入为人处世、治国安邦的社会实践当中。在此意义上,不同于西方实用主义等片面追求利己效用的主观主义价值观,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将宏观的道与具体的、社会的人相联结,以提升人的道德修养、规范人的社会交往为鹄的,从而描绘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想。但是中国传统哲学家们关于体用价值的阐释又具有封建社会背景下的时代局限性,他们尊崇圣贤之道,只是以中国思想史上个别杰出思想家的论断为要旨,这本质上仍是一种英雄史观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体现。对此,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群众史观视角实现了对传统体用价值阐释中英雄史观视角的超越。在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前提下,习近平文化思想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重和合、重践履、重民本的合理性内容,在和合共生方面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和互学互鉴,在知行合一方面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以人为本方面注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归根结底,这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都是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价值旨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从党的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再到党的二十大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矢,瞄准新时代文化建设之的,坚持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地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也在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追求中迸发其真理光芒和实践力量。

二、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从文化发展的理论逻辑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从传统与当代、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中提出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性解答。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7](P11)什么是“古今中西之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阈中,“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紧密关联,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开创、建设、发展自身的现代化一直贯彻着“古今中西之争”。冯契在《〈智慧说三篇〉导论》中强调,“‘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8](P3)。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启蒙为例:“古”与“今”之争涉及历史观问题,即应当以怎样的根本立场与科学态度看待中华

传统文化与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的关系;“中”与“西”之争则涉及认识论问题,即应当用怎样的先进理论和具体实践来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对此,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展示了一条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并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实践中逐渐探索出适合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随着时代的前进、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古今中西之争”不断被赋予与时俱进的丰富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由关注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主题,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主题,又进一步深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主题;由此“古今中西之争”的具体内涵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呈现为三个层面:一是文化传承层面,关于传统与当代的关系问题;二是文化对话层面,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三是文化创新层面,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对这三个层面关键问题的回应,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何以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性解答,也是其体用辩证法的理论逻辑的全方位呈现。

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文化传承之理,在于正确处理传统与当代的关系。

在文化传承层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承继发展关系。其一,明确文化传承之“体”,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语境中,“第一个结合”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以中国实践为现实基础,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追寻真理;“第二个结合”则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以中华文明为文化根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培育“又一次思想解放”的丰硕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坚持‘两个结合’”的原创性观点,极大地拓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既从时间维度上将这一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置于五千多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中,也从空间维度上将这一理论创新的主体力量明确为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的融合统一。由此,通过明确文化传承之“体”,中华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其二,通达文化传承之“用”,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是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实路径。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前提下,怎样促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为此,要善于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以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为例,习近平文化思想从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立场出发,在“明体”层面强调“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理念,提出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等重要原则,在“达用”层面提出加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工作措施,从而将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原则与具体举措相统一,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让传统文化“火”起来,让中华文明焕发活力。其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文化传承发展的“体用贯通”,强调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在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衔接中应张弛有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这个统一的文化生命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基因不能缺位。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9](P88-89)另一方面,尊古不等于复古,守正不代表守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自农业文明时代,有着自然经济和封建制度制约下的时代局限性,并不直接适用于今天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以信息化智能化为导向的工业文明时代,因此,必须按照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对其陈旧的内容形式进行改造,对其合理的内涵价值加以完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文化对话之理,在于正确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在文化对话层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揭示了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关系。第一,文化对话的前提是有民族性的文化话语,即中国话语。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其中重点在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0](P37-38)。可见,做好中国的事情,就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表达好中国的话语,就有本事传播好中国的声音;提炼好展示中华文明的文化标识,就有本事展现好新时代的中国形象。第二,文化对话的内容需有时代性的文化内涵,即中国理论。“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11](P213)新时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背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11](P69);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高屋建瓴地强调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2]一方面,话语体系是对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科学反映,它以富有民族气息和时代意蕴的中国话语表达中国理论,反映中国实践;另一方面,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又构成了话语体系的理论内核与文化支撑,必须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以持续不断地为话语体系建设赋能。第三,文化对话的旨归需有世界性的价值观念,即全人类共同价值。2023年3月,习近平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共同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同时也指出要以文明交流、文明互鉴和文明包容去超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与文明优越。“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习近平文化思想兼具中国风格与世界眼光,在坚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坚定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并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共同价值实现路径的民族化探索,从而能够现实地将全人类共同价值贯彻到各国人民的具体实践当中。中华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不是“地缘政治式”的闭关自守,而应是共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放包容。

中华文化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文化创新之理,在于正确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在文化创新层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揭示了党的创新理论与文化建设生动实践的双向互动关系。习近平指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应呈现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即实践基础——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新的实践基础)——新的理论创新,如此不断前进。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这一组关系集中表现为理论创新与工程建设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要有的放矢地阐释党的理论创新。带着问题意识洞察当代社会思潮和部分理论研究会发现,其中仍存在一些新型教条主义倾向,即“以西解马”“以西评马”,依据西方哲学的某些概念、框架、范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行套用,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虽然不同理论话语的交流、交融、交锋可以促进有意义的新问题、新思路的形成,但必须引起重视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要研究中国问题,表达中国话语,应用中国实践。所谓理论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实现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另一方面,也要切实推进新时代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工程建设。一是建设以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深刻影响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水平,这一项基础工程建设有助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社会生活各方面,通过加强榜样示范作用、关注青少年价值观教育、推出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等方式发挥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二是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这一工程建设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支撑:无论是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还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都需要通过对崇奋进、重知行、尚和合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得到大力弘扬。三是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和文化惠民工程。这一工程建设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环节,不仅有利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明素养,而且有利于从丰富多样的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实践活动中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四是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就以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导向,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理论创新、人才建设等方面实现内涵式发展。

三、坚持“两个结合”之路

坚持“两个结合”,指明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法论路径。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作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4](P10)的表述,强调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2023年6月2日,他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对新时代文化建设而言,“两个结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对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也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赓续和创新。因而“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拓展了实践路径。

一是“以文载道”。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坚持“两个结合”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载之“道”,既蕴含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文化理论,也指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发展道路。从理论性维度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源流根枝之辩”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辩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体用辩证法表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根脉相连、魂脉相牵的内在联系。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历史资源拓展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在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的广阔视野中挖掘优秀理论源泉,汲取思想文化精华,提炼正确思维方法,作出富有历史感和时代感的文化表达。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理论创新要有能力追根溯源,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基本走向;要有自信言之有物,讲清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创造、价值旨趣和鲜明特色;要有水平融会贯通,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契合之处、互补之处、创新之处。从实践性维度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将新时代思想文化工作定位提升到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实践高度,立足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实践和新时代实践,主张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从而将文化自信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中。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举例说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对实践创新的重要意义:“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17](P8)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广阔的文化空间,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并促成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文化自信。

二是“以文传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坚持“两个结合”以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所传之声,既包括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话语,也包括反映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对外宣传声音。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始终把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为此,必须警惕西方资本逻辑包装下的所谓“普世价值”的渗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批判“普世价值”及其背后掩藏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种种观念乱象。正如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的,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决不能盲目追随“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我们批判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即是从批判性的维度凸显“当代的”“中国的”“社会

主义的”“核心的”“价值观”的重要意义,进而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主流思想引领的关键地位。对此,在建设新时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眼明心亮,明辨价值观是非,在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达用”要求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立足本国、走向世界。无论是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并建设相应的践行机制,还是广泛开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以积极推动世界文明对话,抑或是提出并致力于共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传递的中国声音铿锵有力:“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10](P278)正如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形态不仅有西方现代化模式,还有中国式现代化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形态;世界文明的百花园也不仅有西方文明,还有中华文明和多样化的各种文明,这些丰富的文明形态共同书写了美美与共的灿烂华章。

三是“以文化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坚持“两个结合”以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化之人,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时俱进地发展的见证者,即广大中国人民。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辩证法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归根结底就是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从坚持党性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包括文化事业在内的全部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二十大明确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0](P18),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首要内容加以强调,阐明了中国最大的国情、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明确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正确政治立场,让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集中反映群众的意见与心声并运用其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从坚持人民性的方面来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贯穿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鲜明主线。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为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不仅表现在人口规模巨大,而且同时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就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了本质要求。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就是坚持文化创新为了人民、文化传播依靠人民、文化发展造福人民。正如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革命文艺的发展如何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角度,阐明了思想文化领域中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结合,“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5](P857)。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亦强调:“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11](P26),“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11](P23)。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因而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就是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优秀文化作品和文化产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辉光日新。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求是, 2023, (20).
- [2]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7]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8] 冯契文集(增订版):第1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9]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
- [10]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12]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04-26.
- [1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2015-01-25.
-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5]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The Dialectical Approach to *Ti* & *Yong*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Huang Danya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a scientific system that "integrates *ti* (theoretical substance) with *yong*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achieves seamless coherence between the two", where the mutual integration of *ti* and *yong* constitutes the dialectical approach to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From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continuity, Xi's dialectical approach to *ti* & *yong*, under the fundamental guidance of Marxism, has achieve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on *ti-yong* relations, namely the "debate on origins and branches". From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Xi's approach provides a contemporary solution to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by integrating tradition with the present, China with the world, and theory with practice in a dialectically unified manner. From the practical logic of cultural innovation, Xi's approach advocates conveying truth, transmitting voices and nurturing people through culture. Adhering to the methodological path of adap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to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it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approach serves to continuously cultivate and create a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New Era, which possesses greater theoretical guidance, spiritual cohesion, value-based appeal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ntegrate *ti* (theoretical substance) with *yong*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achieve seamless coherence between the two"; "integrate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 作者简介 黄丹阳,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弘毅博士后,辛亥革命博物院—武汉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涂文迁